

“移交”的推力

——以《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法国侨易为例

李 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关键词] 《少年维特之烦恼》; 移交; 侨易; 法国; 狂飙突进

[摘 要] 叶隼教授的“侨易十六义”中指出,“移交”即“移动发生异质文化相交”,“必然涉及到文化体之间的接触和相交”,使得侨入、侨出语境均产生变化。《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歌德在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该文本的法国侨易是讨论“移交”之变创效应的重要实例,具体体现在社会背景、思想与文学语境上的“异质文化相交”。一方面,作为处于第三等级的草根版哈姆雷特,主人公维特面对 18 世纪后期欧洲经济、社会、政治与道德的深刻危机所表现出的觉醒了的资产阶级反抗封建桎梏、追求自由发展的倾向在法国引起持久的冲击波,并使直面社会矛盾的批判精神永久地留存在法兰西文学世界中;另一方面,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在感性与理性之间的“二元三维——大道侨易”的无限变化可能中体现出创造性的载体作用,催生了法国浪漫主义的出现,进一步印证了因“侨”而致“易”,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的观念。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70(2015)05-0023-05

DOI:10.16095/j.cnki.cn32-1833/c.2015.05.004

引 论

叶隼教授在侨易学中指出,“侨”有四义,包括位置迁移、质性升高、乔扮仿拟、侨桥相通,简称“移仿高桥”;“易”亦有四义,包括变易、不易、简易、交易,简称“变常简交”。这相合相生的侨易化生出十六义,其中“移易四义”包括移变、移常、移简、移交^[1]。叶隼教授进一步指出,所谓“移交”可简称为“移动发生异质文化相交”,概说为“任何一种移动,表面上仿佛是个体的活动,但实质上始终是象外有象,有着非常复杂的符号功能和象征意义……还有可能涉及对外在环境的影响,即对侨入、侨出语境都发生影响”^[2]。

将侨易学观念运用在德法比较文学领域,《少年维特之烦恼》(以下简称《维特》)的法国侨易就是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实例。本文将“以侨易学”为依托,考察这部打开德国文学通向世界之门的短小力作是在何种社会背景下传入法国并引起各

个社会阶层的关注与讨论的?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维特热”仅仅针对一种异国情调还是涉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种心理需求与审美认知?进而追问在“移交”的过程中,在德法不同文化体之间的异质相交中,《维特》如何发挥出其作为载体的特殊意义。

在《维特》“侨入”法国之前,法国、英国的某些小圈子仅对德国诗学的零星作品诸如约翰·克里斯托弗·戈特谢德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著作有所了解。当时,德语在欧洲仅仅被视作一个民族的语言,其邻国法兰西的语言则是能够代表有教养的欧洲的语言,连柏林皇家学院(1700 年建立)都是以法语作为官方语言,而德文作品的法译本也常常被认为翻译得不够恰切。长久以来,德国人擅长的文学体裁被认为仅限于田园诗体裁,在这种刻板的印象中德国人在其他所有体裁上的写作都是次级的^[3]。因此,德国传播到国外的文

[收稿日期]2015-03-12

[作者简介]李征,女,辽宁沈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艺术学博士。

学作品一直十分有限。直到布丰、卢梭、伏尔泰消逝之时,莱辛、歌德与席勒在文学界出现,法国诗人多哈(Claude Joseph Dorat,1734—1780)在其《德国诗学观念》中惊呼:“我们(指法国人)的美好时代消失了,日耳曼人,你们的美好时代开始了!”^[4]德国文学遂开始在法国崭露头角。

《维特》(1774)作为歌德的第一部小说,自1776年起被译介入法国,即获得法国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青睐,从1776年至1850年间出版且保存至今的《维特》在10个法译本的基础上有42个版本之多,法国人还将其改编并搬上戏剧与歌剧舞台,取得了巨大成功。其间,1829年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翻译的《维特》以译者匿名的方式出版,并在19世纪获得持续的再版,成为《维特》最经典的法译本,也被法国人视作经典的文学文本——“一个文本,除了它不可否认的典雅优美之外,拥有某种历史影响并且为所有观点建立一个珍贵的证明,在法国,这个文本是《维特》”^[5]。

小说主人公维特因爱情与理想得不到实现导致最终的悲剧结局是不同社会阶层读者最为关注的主题。在1855年6月出版的《当代期刊》中,维特的结局被认为有“故弄玄虚之嫌”,且“损害了其主体部分”^[6]。还有的评论则认为为一位“平常、简单、土里土气、缺乏高雅格调”^[7]的女主人公而丢掉性命是不值得的。此外,也有一些持非负面态度的批评,如《法国信使报》认为维特的结局能够引起人们对他的过激行为的恐惧,并警惕起来。更多的读者则纷纷赞颂文本结局的哀婉动人^[8]。事实上,歌德笔下的许多反叛性人物除了维特之外,还有普罗米修斯、穆罕默德、葛兹等都以悲剧结束。青年歌德在上述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针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反叛倾向以及为争取自由发展而做出的不懈抗争在《维特》里达到了最高峰^[9]。维特的叛逆意识表现为爱情对现实世界的超越,“从这时起,太阳、月亮、星星可以按照它们的幻想来相互和谐地运转,我不再知道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夜晚,我周围的世界消失了”^[10]。

事实上,在《维特》中,令男主人公魂牵梦绕的爱情仅仅是一种装饰,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揭示一个人如何为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而生活、而憧憬,却因封建制度的黑暗压制而全然无法实现的心路历程。维特在自身之外认识自己的能力、超越自我的雄心与带给读者的震撼堪与哈姆雷特相匹敌,在潜移默化中使心灵对美好与自由的追求得到一种提升。所不同的是,维特是位于第三等

级平民阶层的草根版哈姆雷特,在社会身份上是一个普通的平常人,因而使文本更加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在18世纪,德国社会底层尤其表现出期望得救的强烈情绪。歌德、席勒等德国作家在作品中体现出的鲜明的有时甚至带有夸张性的反叛意识正是对德国当时“狭隘的、处于高压下的、过热的迫害气氛”^[11]的一种反应。“到普通道路之外的远方去寻找幸福”^[12]实际上就是追求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不可实现的理想”^[13]。所以,《维特》绝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悲剧,而是借助爱情发展的主线,“对时代问题的一种伟大的典型描述”^[14],正如恩格斯所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15],悲剧结局揭示的是《维特》的反抗性实质。

叶隽教授指出侨易学的研究对象是“侨易现象”,主要关注由“侨”致“易”的过程,其核心点为“迁移”与“变化”^[16]。在其新作《“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中进一步提出“移交”的概念,即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接触和相交,个体或主体因移动而产生变化,由移动而导致异质文化的相交关系^[17]。对于《维特》的法国侨易来说,涉及的“移交”过程,首先是德法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政治上,封建统治下的德意志刚经历了德国农民战争、三十年战争,但始终未获统一”^[18]。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与英国、法国相比甚为软弱,封建贵族专横暴虐。对于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状况恩格斯是这样描述的:“这是一堆正在腐朽和解体的讨厌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感到舒服。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19]。维特的斗争,也是青年歌德的斗争,所针对的是当时的德国封建等级制度对人的个性与发展的压迫与束缚,体现了觉醒了的资产阶级反抗封建桎梏、追求自由发展的倾向。显然,《维特》的批判意义远远超出对落后的德国的状态的批判,它集中了那个时代的一切矛盾^[20],这正是歌德的这部短小力作的伟大性与不朽性之所在!

在法国,当时的广大平民阶层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相似的社会苦难,故与《维特》产生了一种共鸣,而且这种共鸣相当持久: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维特》使法国青年感到热情激荡,而其愤世嫉俗的话语与深沉强烈的内心独白又千百次地激励并抚慰了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惶恐与不安;在此后波旁王朝的复辟时期,人们身后是一个未被

摧毁的、仍有专制制度痕迹的过去,前方则是隐约的光明未来,于是法国人陷入“一种对生活的盲目的急躁、一种狂热的等待、一种对未来的时机尚不成熟的野心、对再生的思想的陶醉、……一种心灵的极度饥渴”^[21],同时又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与指导而常常陷入迷茫与孤独,或走向自省或寻找超越当下。但是,无论是为社会状况感到疲惫的人、仍然怀有野心而沉思的人、还是迷失方向或痛苦彷徨的人都在《维特》中找到一种情感的出口。《维特》作为反封建、反压迫意识的代表作品在法国的侨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歌德在其中针对社会矛盾的写实与批判,在巴尔扎克、司汤达的作品里得到极大的彰显与坚定不移的延续。

二

《维特》之所以能在法国获得不同社会阶层的广泛关注与接受,不仅因为其“移交”过程中的社会背景,更因为这里还涉及思想上与文学语境上的“异质文化相交”。“17、18世纪的法兰西是欧洲思想和心灵上的领袖”^[22],尤其卢梭的思想与作品在18世纪的德国广泛传播,并对青年歌德的创作产生影响,《维特》即与之前出版的卢梭的《新爱洛绮斯》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23]。歌德的早期创作是以一种德国方式对卢梭路线的继续,因而这也使得法国读者在阅读《维特》时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没有陌生之感。更重要的是,青年歌德将卢梭的路线引向了新的高度,他“描写市民日常生活中富于感情的内心活动,目的是在这种内心活动中描绘出那些在与封建社会的对立里正在产生的新人的轮廓”^[24]。

这种新人的轮廓在德国最早是在“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中得以显现的。这一始于18世纪70年代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代表了新的道德伦理观念,它是对欧洲18世纪后期经济、社会、政治与道德的深刻危机的一种回应。狂飙突进运动主张将自然、感性、天赋、情感与独创性作为文学的源泉^[25]。歌德的早期文学创作与“狂飙突进运动”紧密相连。“Sturm und - Drang”可直译为“暴风雨与猛烈推进”,《维特》中有大量关于“狂飙”与“突进”的词语出现。如在《12月20日》,维特“走近窗子,亲爱的,透过掠过的云朵——被暴风雨驱赶的云朵,我依稀可辨在那永恒天空上零星散落的几颗星星”^[26]。在《12月12日》,维特面对解冻的河水在峡谷里汹涌咆哮时想到:“下去吧!……连同我的痛苦一起投下

深渊……为了与那风暴一起把那大块大块的乌云撕碎,激起滚滚波涛!”^[27]

狂飙突进运动以崇尚自然为基本思想,认为自然并非恒定不变,而是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正如人的生命也是一种持续的生长,这种生长激励并要求人不断更新自己。《维特》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标志性作品,透过诗意的棱镜观看自然,“开启了通向一切艺术、一切温柔浪漫感受的、月光的、森林之美与绘画之美的灵魂,一句话,它开启了情感与美的享受……”^[28]。法国大革命前夕上流社会的风气已经在发生转变,感性的人与事物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而此时的德国文学恰逢其时,《维特》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法国读者对清新、自然、感性、纯朴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其中德国壮丽的自然景色颇为吸引法国人。在法国,极具装饰性的园林构成“谈话沙龙的继续与延伸”,而德国的自然却与之截然不同。这与封建制度末期两国不同的社会状况息息相关。在德国,资产阶级并未达到政治上的存在,它通过“在物质生活之外的、朝向不断更新的自然的一种逃逸来在文化上证实自我,并在心灵深处不可测知的事物中栖息”^[29]。因而,德国的自然与法国人工化、甚至矫饰的自然相比更为原始、天然。《维特》中充溢着高耸的悬崖峭壁、无路可通的森林、幽深僻静的丛林甬道的描写,这同当时深受法国读者喜爱的卢梭的作品一样,“让那些从来只在中午才起床的人看见晨曦,让那些只驻留在沙龙和宫殿之上的眼睛看见了风景,让那些只在剃光了头的绿篱和笔直的花坛之间漫步的人们见识了大自然的花园,……认识了田园、孤独、家庭、百姓、质朴但饱含深情的快乐”^[30]。更重要的是,《维特》并非单纯为自然而自然,而是将主人公生活中感受到的苦闷与忧伤融入大自然,在荒野里盘桓,在山岩上倾诉,在星光里作别,于是大自然成为心灵的镜子,从而幻化出感性的力量。如果说法国的文学批评界有些人对《维特》持保留意见的话,那么拥有敏感心灵的读者们却热情地接受了不幸的男主人公的情感抒发。

瑞士文学史家罗塞尔(Virgil Rossel,1858—1933)认为,《维特》的独特性既不在贯穿文本始终的爱情主题中,也不在洋溢着青春痴狂的真挚情感中,而在“可以概括男主人公的整个存在的痛苦与骄傲的点点滴滴中”^[31]。维特的痛苦、忧郁使其成为“现代社会最初的典型之一”^[32]。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开始厌倦理性主义的狂热,在智识

上逐渐呈现出摆脱僵化而令人紧张与不安的形而上学的束缚、回归感性与生活的趋向。

正如法国作家尚弗勒里(Champfleury)在1853年所说:“作品与人都从属于某一时代,他们是它的孩子及它的反映……不是歌德创作的《维特》……我们在书中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情感表现”^[33],正因《维特》本身“任由感性精神任意驰骋”的天然特质,它才在法国读者那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交感现象。《维特》对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诗人、作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产生了一系列接近于叶隽教授在《“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中谈到的“仿交”^[34]意义上的作品,如夏多布里昂的《勒内》、贡斯当的《阿道尔夫》、塞纳库尔的《欧伯曼》、斯塔尔夫人的《戴尔菲娜》、圣伯夫的《约瑟夫·德洛尔姆》与《情欲》、缪塞的《世纪儿忏悔录》与《罗拉》、乔治·桑的《莱丽亚》、拉马丁的《拉斐尔》等,在这些作品中都可以辨识到维特的影子。拉马丁在1866年曾谈到:“我记得在少年时代,在我家乡冬季严寒的大山里,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维特》,它带给我的印象从未被抹掉或是减退。书中那饱含伟大情感的忧郁感染了我。随着它,我触摸到人类苦痛的深处……”^[35]。关于法国文学作品中与《维特》产生仿交的文本之生成范例值得进一步展开研究与追问,但是在这里可以肯定的是,《维特》的法国侨易通过“移交”的过程助推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之创生,埃蒂安·让·德勒克吕泽(1781—1863)将其划入对法国浪漫主义的诞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之列。

结论

1830年,《维特》的法国侨易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之后归于平静,但是顶峰虽过,法国人对其兴趣犹存。“德法互动”在《维特》的筚路蓝缕之后,始终在极度的纠葛缠绵中不断前行^[36],虽然此后歌德在法国的身份由“《维特》的作者”逐渐转为“《浮士德》的作者与令人困惑的哲学家”,但是《浮士德》对法国文学的影响无论在深度与持久性上都远不可与《维特》同日而语,《维特》最终走入并留存在法兰西精神中。正如托马斯·曼所说:“维特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仅是关涉一个社会、宗派或学派的一件事情,也不仅仅是关涉德国的一件事情——它抓住了世界。”^[37]德国文学也因《维特》而在文学领域里暂时接替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力量。《维特》打开了德国文学通向世界之门,自此,德国文学对自身力量开始有所意识,对国外的传播从未间断。通过对《维特》的法国侨易的梳理,因“侨”而致“易”的过程清晰地显现出来。得益于《维特》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一方面,直面现实矛盾、关注当下问题的主体观照在法国文学中扎下了根;另一方面,感性的认知方法成为心灵成长的一种催化剂,进而加速了对法国僵化停滞的理性主义的逆袭。更重要的是,《维特》的法国侨易印证了“移交”已然超出个体交易范畴,使一部具有鲜明时代印迹与国家印迹以及不可让与的人性的文本发挥出巨大的变创效应。

[参 考 文 献]

- [1][2][17] 详见《“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载于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 [3] La Journée de l'amour, Paris, 1774, pp. 35, 参见 Christian Helmreich, "La traduction d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en France (1776—1850), Contribution à une histoire des transferts franco—allemands", in *Revue 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1999(12), pp. 182.
- [4] 参见 Virgile Rossel, "La Littérature Allemand en France au XVIIIe siècle", in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2e Année, No. 2 (1895), pp. 178.
- [5] Christian Helmreich, "La traduction d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en France (1776—1850), Contribution à une histoire des transferts franco—allemands", in *Revue 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1999(12), pp. 192.
- [6] *Revue contemporaine*, juin 1855, et Caus. du lundi, XI, pp. 250, 参见 Fernand Baldensperger, "La Résistance à Werther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in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8e Année, No. 3 (1901), pp. 392.
- [7] Melchior Grimm, *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 éd. par Maurice Tourneux, t. 12, Paris, Garnier Frères, 1880, pp. 74, 参见 Christian Helmreich, "La traduction d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en France (1776—1850), Contribution à une histoire des transferts franco—allemands", in *Revue Germanique Internationale*, 1999(12), pp. 182.
- [8] 参见 Fernand Baldensperger, *Goethe en France — Etud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04, pp. 11.
- [9][14][20][24] [匈]卢卡契:《论〈少年维特之烦恼〉》,载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
- [10][26][27] 中文译自 Goethe, *L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traduit de l'allemand en français par Pierre Leroux,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99, pp. 32, 68, 59.
- [11][22][奥地利]弗里德里希·希尔:《欧洲思想史》(Europäische Geistesgeschichte)赵复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 版,第 435—436、407 页。
- [12]Mercure de France, an IX., 参见 Fernand Baldensperger, "La Résistance à Werther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in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8e Année, No. 3 (1901), pp. 382.
- [13]Adolphe Bossert, Goethe, *ses précurseurs et ses contemporains*, 3me édit, Paris, Ulan Press, 1891, pp. 260.
- [15][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版,第 633—634、166 页。
- [16][36] 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9—21、50 页。
- [18]叶隽:《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爱情悲剧后的青春迷惘与制度因素》,《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 [21]Edgar Quinet, *Histoire de mes idées*, Paris, Flammarion, 1972, pp. 240.
- [23] 详见 Anouchka Vasak, "Héloïse et Werther, Sturm und Drang: comment la tempête, en entrant dans nos coeurs, nous a donné le monde", in *Ethnologie française*, 2009/4, vol. 39, p. 677—685.
- [25]Musée Goethe de Düsseldorf, *Goethe et la France*, Paris, Goethe-Institut, Paris, 1982, pp. 19.
- [28]斯丹达尔语, *Physiologie de l'amour*, LIX., 参见 Fernand Baldensperger, *Goethe en France — Etud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04, pp. 84.
- [29] Wolf Lepenies, *Melancholie und Gesellschaft*, Francfort, 1969, pp. 76., Werner Gephart, en collaboration avec Vanessa Bressler, *Voyages Sociologiques France — Allemagne*, Paris, L'Harmattan, 2005, pp. 81.
- [30] Hippolyte Taine, *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réface de Jean—Paul Cointet, Paris, Robert Laffont, 2011, pp. 204, 见黄艳红:《制度、精神、心理——伊波利特·泰纳〈旧制度〉述评》,《法国研究》,2014 年第 2 期。
- [31] Virgile Rossel, *Histoire des Relations Littéraires entre la France et L'Allemagne*, Paris, Librairie Fischbacher, 1897 (U. S. A., Harpress Publishing, 2013), pp. 95.
- [32] Emile Montégut, *Revue des Deux Mondes*, T. 11 : *Types modernes en littérature — Werther.*, 参见 http://fr.wikisource.org/wiki/Types_modernes_en_Litt%C3%A9rature_Werther
- [33] *Le Réalisme : la littérature en Suisse*, Fernand Baldensperger, "La Résistance à Werther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in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8e Année, No. 3 (1901), pp. 392.
- [34] 仿交:简释为“模仿,像变之后发生交易”。可概括为“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摹仿的因素,但只要出现‘仿拟’的过程,就必然出现二的因子,也就难免交易的必然,但这种交易与一般的交易不同,就是以一方学习另一方为主轴的交易过程”。详见《“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载于叶隽主编《侨易》(第二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 年版。
- [35] Alphonse de Lamartine, *Cours familier de littérature — XXI*, Paris, Edition la Bibliothèque Digitale, 2013, pp. 9.
- [37] 参见 *L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de Goethe, l'émission du samedi 18 février 2012, <http://www.franceinter.fr>.

The Reception of *L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in France

LI Zhe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ASS, Beijing 100732, China)

Key Words: *L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France; Kiao-I; Sturm und Drang

Abstract: As suggested by "the sixteen meanings of 'Kiao-I' by Mr. Ye Jun," displacement gives rise to heterogenous cultural intersection" and "involves necessarily the contact and intersection between cultural bodies", thus causing the changes in their contexts. *L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is Goethe's first novel as well as his most influential work in France. The reception of this text in France serves as an important example for the discussion of the creative effect of "displacement-intersection", as evidenced by "the heterogenous cultural intersection" in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oughts and literary context. For one thing, as the Hamlet of grass-root class, the protagonist Werther, facing the European economic, social, political and moral crisis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18th century, has displayed his struggle against the feudal shackles and pursuit of free development, which trigger everlasting impact and preserve the critical spirit that aims at addressing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French literature world. For another,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Sturm und Drang, *Les Souffrances du jeune Werther*, in the infinite changes between sensibility and sense, in the "binary three dimensions, Kiao-I", demonstrates the creative carrier function and hastens the emergence of French romanticism, thus further testifying to the theory that material displacement leads to spiritual qualitative changes.

[责任编辑:林晓雯]